

个体生命的终极吟唱

李跃红 著

思想史视域中的汉语神学研究



人 民 出 版 社

个体生命的终极吟唱

廖世承先生教育思想研究

廖世承 著



个体生命的终极吟唱

李跃红 著

思想史视域中的汉语神学研究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旭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个体生命的终极吟唱——思想史视域中的汉语神学研究/李跃红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01-011166-7

I. ①个… II. ①李… III. ①神学-思想史-研究-中国-研究 IV. ①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9827 号

个体生命的终极吟唱

GETI SHENGMING DE ZHONGJI YINCHANG

——思想史视域中的汉语神学研究

李跃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288 千字

ISBN 978-7-01-011166-7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总 序

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甄朝党

云南民族大学校 长、教授、博导 张英杰

云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培养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高级专门人才的综合性大学,是云南省省属重点大学,是国家民委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点民族院校。学校始建于1951年8月,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而创立和不断发展,被党和国家特别是云南省委、省政府以及全省各族人民寄予厚望。几代民族大学师生不负重托,励精图治,经过近60年的建设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创新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民族问题研究基地、民族文化传承基地和国家对外开放与交流的重要窗口,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

云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办学层次较为丰富、办学形式多样、师资力量雄厚、学校规模较大、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综合性大学。目前拥有1个联合培养博士点,50个一级、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和专业硕士学位点,60个本科专业,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和管理学9大学科门类。学校1979年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2003年被教育部批准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社会学博士研究生,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立项建设的新增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国家级、省部级特色专业、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数、获奖数等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持续增长。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民族语言文化、民族药资源化学、东南亚南亚语言文化等特色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学校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得到较好形成和健全完善,特色得以不断彰显,优势得以不断突出,影响力得以不断扩大,地位与水平得以不断提升,学校改革、建设、发展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区建设、党的建设等工作不断取得标志性成就,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明,为国家特别是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发挥作用、做出贡献的力度越来越大。

云南民族大学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长期以来,学校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产出大量学术创新成果,提出一些原创性理论和观点,得到党委政府的肯定和学术界的好评。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著名民族学家马曜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提出“直接过渡民族”理论,得到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等的充分肯定并采纳,直接转化为指导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为顺利完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维护边疆民族地区团结稳定和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汪宁生教授是我国解放后较早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为民族考古学中国化做出重要贡献,他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最近几年,我校专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多,成果质量高,结项成果中有3项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刊发《成果要报》报送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发挥了资政作用。主要由我校专家完成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部分、云

南民族文化史丛书等都是民族研究中的基本文献,为解决民族问题和深化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还有不少论著成为我国现代学术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国家。国家的崛起为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机遇,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9 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云南,提出要把云南建成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指导思想。云南省委、省政府作出把云南建成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战略部署。作为负有特殊责任和使命的高校,云南民族大学将根据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遗产的功能,围绕把学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民族大学”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力度,培育和建设一批国内省内领先的学科;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抓好科技创新,提高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把云南民族大学建设成为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高水平民族大学,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龙头性、核心性、基础性的建设工程,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与重要任务。为更好地促进学校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学术创新,学校党委和行政决定编辑出版《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这套文库将体现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特点。经济社会需要是学术研究的动力,也是科研成果的价值得以实现的途径。当前,我国和我省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有许多问题需要高校研究,提出解决思路 and 办法,供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参考和采

择,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我们必须增强科学研究的现实性、针对性,加强学术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才能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的社会作用,提高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和贡献度,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高校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云南民族大学过去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相信,随着文库的陆续出版,学校致力于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优良传统将进一步得到弘扬,学校作为社会思想库与政府智库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增强。

这套文库将与我校学科建设紧密结合,体现学术积累和文化创造的特点,突出我校学科特色和优势,为进一步增强学科实力服务。我校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立项建设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这是对我校办学实力和水平的肯定,也为学校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还对学校建设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博士生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它要求有高水平的师资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支持。学科建设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础,我们将按照国家和云南省关于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的要求,遵循“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创新打造特色,以特色强化优势,以优势谋求发展”的思路,大力促进民族学、社会学、应用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公共管理学等博士授权与支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并将这些学科产出的优秀成果体现在这套学术文库中,并用这些重点与特色优势学科的建设发展更好地带动全校各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努力使全校学科建设体现出战略规划、立体布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全面发展、产出成果的态势与格局,用高水平的学科促进高水平的大学建设。

这套文库将体现良好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规范。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寻真理,创新知识,完善社会,促进人类进步。这就要求研究者

必需有健全的主体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倡导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文库作者要以为国家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公众负责、为学术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严谨治学,追求真理,保证科研成果的精神品质。要谨守学术道德,加强学术自律,按照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开展研究,撰写著作,提高学术质量,为学术研究的实质性进步做出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思想深度、学术创见和社会影响的成果,也才能让科学研究真正发挥作用。

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们的关心支持及全校教学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一定能成为反映我校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和展示我校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品库,一定能成为我校知识创新、文明创造、服务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文库建设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恳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帮助我们将文库编辑出版工作做得更好。

二〇〇九年国庆于春城昆明

序 一

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学术领域,出现了一些独特的探究及复杂的发展,从而将人们的思考不断引向深入。在这些颇有争议且论战激烈的问题中,“汉语神学”的表述、内涵、体系及特色之询问或质疑则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对之可谓众说纷纭,各执己见,迄今仍未达到共识。恰巧在这一难以沉寂的热议氛围之中,李跃红教授推出了其个人新著《个体生命终极的吟唱——思想史视域中的汉语神学研究》,以其充分的学术准备和独特反思而加入了这一持续已久的讨论中。

与以往人们对“汉语神学”之神学性或学术性的分辨不同,李跃红教授提出汉语神学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从而以思想史探究的角度切入,尝试找出其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发展的承接及关联。这种构想以其大胆和新颖将“汉语神学”的发展置入一个更为广泛的当代社会思潮之弥散的处境中,由此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和启迪。

中华文化曾以其“大一统”的完备体系而独立于世界,并延续了其数千年的发展。中国内向型的地理环境使其主要关注一种内涵式的发展,其内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外扩的志向,“中国”这一表述本身最初也是意指其国家的中心、中央,与“四方”相对,并以之来安“四方”、服“四夷”。这样,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习惯以“天下”、“四海”来自居,其优越感使之满足于己已为“中”的“天下一统”、“天下一家”的“大国”气概,故古代王朝多有“大秦”、“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之称,并与今天的“大中华”观念自然相联。只是在这种以我为主、以我为中的自我意识之前提下,中国方有“海纳百川”的胸襟,相信万邦来朝,“四海一家”、“夷夏一体”之“有容

乃大”。这种颇具封闭性的“自豪”和“自信”，在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士来华以科学文化方式进行传教时才真正受到挑战。利玛窦带来的《山海輿地全图》介绍了西方地圆之说，打破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中国为世界之“中”的思想由此亦发生根本动摇。西方传教士一开始以权宜之计而曾将中国画在其世界地图靠“中”之处，但地圆的观念最终使这种位“中”论不攻自破，中国人对整个世界及其自我有了与以往见解迥异且具颠覆性的认知。这种认识上的根本变革是因“西学东渐”而来的，从此中国人意识到在其之外还有一种强大的、系统化的“西学”存在。不少中国有识之士由此而有了对“西学”的好奇、向往，甚至敬畏，而中国政治为维护其文化“道统”也有了防范“西化”的意识及担忧。可以说，“中学”与“西学”乃两种强势文化的相遇，随后的过程则既有对话、沟通、吸纳，也有对立、矛盾、冲突。李跃红教授将当代汉语神学视为这一西学东渐过程的延续及新的突破，从而深化了“汉语神学”探究的意义，也使人们由此可以重新梳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发展的脉络精髓。

“西学”在中国之传播并不是很顺利。自“中国礼仪之争”所引发的中西文化冲突，导致基督宗教思想体系在华成为另类，其神学亦未有真正系统的发展。鸦片战争及此后的中国近代历史更使这种冲突上升到政治层面，基督信仰及其神学由此成为“西学”体系中被中国思想文化所主要排拒的内容之一。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本来基督宗教的思想学说曾以圣经汉译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一运动的酝酿，然而在反帝、反封建及反殖民化的浪潮中，社会舆论乃“救亡压倒启蒙”，中国从“西学”中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基督信仰却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构成而遭到普遍否定。其结果是，现代中国的“洋为中用”主要是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实用理性”和“实践哲学”，其价值观念与工具效用形成了奇特的结合，很少有人奢谈所谓“超越”、“终极”的意义，也缺乏基督宗教“罪感文化”中的那种自我反省、反思的精神。直到“文革”结束，中国人才重新开始认识那种具有深蕴意义的“罪感意识”，才在竭力找寻自我文化之魂的同时冷静、清醒地打开国门看世界，有了对“西学”主动、积极的体认及引进。这就是

当代汉语神学得以萌生的现实土壤和历史背景。

李跃红教授在对汉语神学的全新研究中正是把握住这一历史特点和社会氛围,故而才有更深远的发掘和更重要的突破。他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当代汉语神学形成及发展的进程,对其基本轮廓亦有比较清晰的勾勒,从而鲜明体现出这部新著的现实意义及学术价值。当然,汉语神学如同“西学”整体一样在中国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由这一议题所引发的意见分歧和观点冲突已端倪渐显,并有其进一步“扩展”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李跃红教授的相关研究可谓恰逢其时、弥足珍贵。不过,“神学”在中国有何作为,“汉语”之扩展有无其边界,这也都是其研究者必须深思的。中西这两种文化不同表述在此的奇特结合是一种奇迹,也蕴含着各自文化精神及思想传统中的期盼和梦幻,我们对之既应抱有美好的愿望,亦必须坚持批判的精神。总之,“西学东渐”的曲折过程乃一面历史之镜,会给汉语神学的当代发展带来鞭策以及值得注意的警醒。

是为序。

卓新平

2012年4月8日于北京

序 二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其专著《李鸿章传》第六章中论及李氏在1875年向清廷呈交的奏折,其中有一段与当下持狭义民族主义观点的中国学人大有异曲同工之妙,甚具玩味,他说:“现在东南海疆长达万里,各国在中国通商传教,来来往往非常自由,在北京以及各省大量聚居,表面上打着和平旗号,实际上却是盘算着吞并中国之阴谋诡计,一国生事,其他国家跟着煽风点火,实在是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①。

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金耀基教授分别从言技、言政和言教等三个角度去看近百年以来中国的种种应变,从年份角度,西方列强文化是由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船坚炮利的方式进入中国;从接受的角度,是从被迫应付到主动吸收西方文化;从层次的角度,是从着重工具性的器物技能走向社会制度的变革并至终迈向文化、思想和行为的层面。从领导人物的角度是由李鸿章提倡吸收西方的器物技能以为可以保家卫国,至晚清康有为、梁启超,民初孙逸仙和陈独秀等人发现器物技能只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之小学,更重要的是引入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帮助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之转型,及至后来的五四运动更深入探讨中西文化、思想和行为之差异与优劣。^②从这个中西之争的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20世纪20年代初,反基督教运动紧随新文化运动之后并提出发人深省的口号:“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

① 梁启超著,雾满拦江译:《李鸿章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②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第113—134页。另无独有偶,甘阳以近似的角度道出当代中国文化走向的三部曲,是谓言技、言政、言教。参见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国人”。^①

这种对中西古今的文化和思想之争,自五四以来持续在中国学界备受关注,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迎来的改革开放开启了80年代中期在中国学界兴起的“文化热”。在这一波被形容为“理想主义^②、知识重构^③,引进西学^④”的文化热潮,其中大陆知名小说家阿城从知识结构、文化重构和政治权力的角度,解读中国近百年来的思想史之变迁,论点颇值得玩味。他认为1840年强势来华的西方以坚船利炮的方式撼动中国千年来的知识结构,1919年的五四运动由国人主动引入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大大撼动中国千年来的文化构成。这种观点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其中一个^⑤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ethos),在这个“理想主义,知识重构,引进西学”的文化热潮中,当时有为数极少的中国学者提出在众多进入西学研究的学科里,“基督宗教研究”是其中一道长久以来被误读和被忽略的西学资源,同时中国学者应注意到基督宗教虽然已是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其与西方学术传统却一直保持着既排斥又吸收的互动关系,^⑥尤有进者,基督宗教思想在众多西方思潮中也是一个甚具动力的文化资源可以抗衡“现代性”的冲击。^⑦另一方面,因着改革开放带来宽松的宗教政策,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的宗教热潮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为提高普罗大众对各个宗教的正确认识和鉴赏力,中国学界遂出版为数相当可观的诸宗教导读本和

① 朱维铮:《五四时代的非宗教运动》,载《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268页。

② 查建英编:《陈平原》,载《八十年代访谈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③ 查建英编:《阿城》,载同上书,第5—29页。

④ 查建英编:《甘阳》,载同上书,第159—230页。

⑤ 按查建英的观点,当时有三波学术风气,“中国文化书院”要复兴传统,“走向未来丛书”是引进西方前沿自然科学,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引进西学,批判东西传统。

⑥ 段琦:《美国宗教坛变论》,载王志远编:《宗教文化丛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⑦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普及本^①,其中基督宗教的导读本更成为国人认识西方文化及宗教的重要入门著作。因着学界和民间对基督宗教文化的关注和兴趣,这就形成了本书作者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生发于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神学,其出现与教会和传教活动并无联系,相对的这个“新知识体系”^②的出现是来自中国学者对新知的好学和吸收,其生发和植根土壤是中国学界而不是教会信众,因此作者强调必须把汉语神学置于思想史的框架和方法进行研究,方见分晓。

当本书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剖析汉语神学的生发和发展,这就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基督宗教研究热潮与同年代的文化热潮之间的偶发联系^③,其间中国与海外个别学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更起了难以估量的协同效应。就以笔者个人经历为例,我作为香港本土出生的中国人,早自20世纪80年代以一河之隔的距离观察着这个奇特和令人沸腾的文化现象,在其中我也被感染去思考基督宗教研究与中国知识重构的种种关系。当我有机会于1993年与当时名噪一时的大陆学人刘小枫教授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彻夜深谈上述这个百年未见文化思潮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基本问题:教会外知识人与教会内神学人共同协作,在人文学界建构基督宗教学术体系是否有可能?其中又衍生多个相关问题,使我继续纠缠十数年,至今挥之不去;这也成为我们日后倡导“汉语神学运动”的基本问题。

1. 从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的角度,教会外的知识人和教会内的神学人,

① 其中的佼佼者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志远研究员自1989年以来主编的《宗教文化丛书》,历时十年,共出版五十多种。

② 按清华大学王路教授的分析,他认为汉语神学的种种论争可归结为信仰与知识之分别,“神学的特征是信仰,知识的特征则主要是公共性。作为信仰的神学,即使是作为知识传授的,也会带有一种愿望甚至目的,即通过神学知识的传授而使神学的信仰得到传播;但是作为知识的神学却不同,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播神学的信仰,而是为了传授一种具有信仰的知识,从而使这样一种知识成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并且与其他知识并列,一起构成人类的知识体系。在这种意义上说,汉语神学与一般神学确实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它不是以信仰为目的,而是以知识为目的。”王路:《从学科分类看汉语神学》,载《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讯》,2006年第1期。

③ 本书作者对这两者之偶发性关系作了颇为细致的爬梳,参见本书第二章。

他们如何变革教会的神学知识结构,甚至引发一次又一次的神学范式的转移?

2. 教会神学与人文神学有合作和互动的可能吗?

3. 千百年来中国知识人向来对基督宗教心存拒斥,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人在没有西方教会和中国教会的鼓动下,自发性地研究基督教文化和思想,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身处海外的神学人可以向他们学习什么?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4.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人与自唐朝景教入华后凡一千三百多年的中国知识人对基督教研究的诉求和切入点有何异同?

5. 当中国学人不断参与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和诠释工作,这种崭新的知识体系如何丰富其自身的专业和学科?

6. 汉语的丰富思想资源和多元地域的生存经验与基督宗教的思想相遇后如何在人文学界被转化、创新和吸纳成为新生的知识体系?

7. 在人文学界生成的“汉语基督宗教研究”和其学术群体与中外教会的认信群体如何建立互相尊重和衷诚合作的关系?^①

因着机缘巧合,我于1992年开始在香港道风山工作,主事探讨建设中国基督教之可能性。道风山的工作传统与我的中国基督教的梦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遂使我能调动工作资源把个人梦想实践为具体行动。^②自1993年起,我就以香港道风山为工作基地,与刚自瑞士毕业回香港中文大学工作的刘小枫博士^③合作,推行多项甚具试验性质的学术工程,分别是:邀请中国学人参与翻译历代基督宗教典籍及对其进行立足于人文学界的处境化诠释,培育中国大陆新一代的基督教研究学人,与中国学人就基督宗教研究的课题进行对话和合作,促进中国学界与海外学界的交流。藉此响应中国学

^① 原来的问题可参见杨熙楠编:《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第viii页。事隔十多年,我的问题在脉络上有所修订,但基本问题没有改变。

^② 杨熙楠:《前传:道风山的汉语神学》,载《风随意思吹——艾香德与汉语神学》,香港:道风书社2010年版,第1—9页。

^③ 刘小枫自1993年起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全职研究员至1996年止,随后以全职身份出任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至2002年离任。

界对基督教研究的种种需要和兴趣。

经过两年的试验,我们得悉这些学术工程得到中国学界积极的响应和肯定,为使这些学术工程能够长远发展及享有高度的学术自主权,我们遂于1995年在道风山上成立另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命名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以便制定长远规划,响应中国学界的需要。尽管20世纪80年代这个“理想主义,知识重构,引进西学”的思潮并不是以基督宗教作为主体考虑,甚至是颇为隐性和边缘的^①。但我们认同部分中国学人视基督教研究为新知识体系的探索,并相信这新知识体系将有益及丰富中国学术。因此,新成立的研究所之工作要旨就是制定各项学术工程,藉此促成中外学人共同建设这个崭新的知识体系,为此我们冠名这个新兴的学术思潮为“汉语神学运动”,此运动旨在为中国学界“推动基督教研究、建设汉语神学、丰富中国文化”。

这工作的起点是由研究所主动邀请两位志同道合的中国学人刘小枫教授和何光沪教授,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这个新兴学术运动的文化现象和建构初阶理论^②,由此引发两岸三地的学者对此新兴思潮的关注和兴趣^③,从而汇聚志同道合的中外学者共襄发展此思潮的各项学术工程及建设理论。^④

① 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0—230页。从查建英对12位被访者中,只有甘阳轻轻带过刘小枫和何光沪倡导的基督宗教研究进路,从中可见此进路之边缘性。

② 刘小枫:《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载李秋零、杨熙楠编:《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三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及何光沪:《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和《汉语神学的方法和进路》,载李秋零、杨熙楠编:《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第144—178页。

③ 李秋零、杨熙楠编:《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三卷本。查该丛书的所有文章主要来自三个论文集,杨熙楠编《汉语神学雏议》和杨熙楠、雷保德编《翻译与吸纳——大公神学与汉语神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4年版)及三届汉语神学圆桌会议论文集。第一届汉语神学圆桌会议——汉语神学与现代性,马来西亚金马伦,1996年。第二届汉语神学圆桌会议——基督教与现代社会文化变迁,马来西亚沙巴,1998年。第三届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圆桌会议——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昆明抚仙湖,2005年9月19—23日。另有少部分文章来自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讯的主题文章。

④ 从《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三卷本可见参与此运动的学人分布甚广,学界与教会界有良性互动和合作。